

廣州文史資料

第十一輯

一九六四年第一輯

(內部發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廣州文史資料

第十一輯

一九六四年第一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廣州市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一九六四年三月

編輯凡例

一、本選輯的印行，旨在积累历史資料和推进史料征集撰写工作的开展。所选的稿，多是撰写者（提供者）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聞（或虽非亲身经历，但对某一项史实很熟悉，并掌握到第一手材料而編写的），各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这种史料是各人从不同的角度提供的，内容可能不尽翔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因此，本選輯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发行，以供历史工作者的参考。

二、本選輯所搜集的史料，包括清末到全国解放前各个时期的各个方面，举凡政治、軍事、經濟、文教、艺术、宗教、民族、华侨、旧社会生活等的史料，不拘体裁，不求完整，只要真实具体而能反映当时重要历史事件或社会面貌的发展变化者均可选入。

三、本選輯的資料，歡迎閱者提出补充和訂正。

四、本選輯对来稿可加以綜合、刪节和文字上的修改。

目 录

有关中华革命党活动之回忆·····	罗翼群 (1)
中华革命党澳門討龙活动杂忆·····	馮秋雪 (38)
护国討袁 (世凱) 的軍务院点滴·····	譚廷甫 (47)
兩广都司令部見聞·····	梁少华 (54)
龙济光三次入粵的追忆·····	彭智芳 龔志鑾 (61)
辛亥革命前后我参加欽防两次起义的回忆·····	唐頌南 (75)
有关广州旧警察史料前記·····	(85)
清末至民初广州的警察机构·····	林 仁 (89)
魏邦平任广东省警察厅长兼广东全省警务处长 时的警察·····	李希賢 (105)
陈济棠踞粵时的广东省会公安局見聞·····	麦思敬 (111)
余汉謀踞粵时的广州警务亲历記·····	李洁之 (122)
汪伪的“警政一元化”·····	一 勺 (141)
解放前夕广州市警察局·····	練秉彝 麦竹軒 (145)
“荔灣惨案”我知我見·····	麦竹軒 鍾鉦声 (153)
广东司法界派系及其主要人物·····	黎思复 邝震球 (158)
广州淪陷时期法院看守所見聞·····	譚子經 (171)

补充·訂正·質疑

- 《華僑資本的五家銀行》的補充訂正……………黎照寰（179）
- 《汪精衛與蔣介石之間》的訂正……………梁福文（179）
- 《我所知道的陳公博》一文的訂正……………徐思遠 高承元（180）
- 《關於清代廣州駐防漢軍旗的歷史補訂》的勘誤…錢實甫（180）
- 《新桂系勾結日本帝國主義事實》一文的訂正……………馮 璜（181）
- 關於山陝軍在廣州問題的來信……………邱漢強（182）
- 《我與富國煤礦公司》一文的訂正……………蔡鉄菴 陳延攸（183）
- 《廣州文史資料》第九、第十輯勘誤表……………（185）

有关中华革命党活动之回忆

罗翼群

一、前言

二、“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員概况及广东之“討龙”

三、中华革命党在南洋的活动和与“水利社”之斗争

四、东京紀行及香港《现象报》出版

五、在南洋劝募“革命公債”情况

六、一九一六年随朱执信、邓仲元“討龙”

七、上海中华革命党事务所见聞

八、有关行刺活动内幕

1. 鍾明光行刺龙济光之失败

2. 对方声濤之狙击

3. 行刺程璧光

4. 参与行刺活动人物事迹

一、前言

一九一四年七月，中山先生在东京改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领导討袁于先，号召护法于后，艰苦奋斗，过程曲折，时逾五載（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始再改組为中国国民党）。关于改組为中华革命党之原因和目的，已分別詳《二

次革命后对国民之宣言》及中山先生致黄兴书及致海外同志各书；陈其美致黄兴书中亦有詳述，毋待复叙。茲篇所紀，悉以当时个人活动范围内之亲历見聞为限，在紀事方面，除末章有关鋤奸内幕作特写外，余均按年月为序，斷于一九一七年护法运动前夕。《广州文史資料》第四輯所刊拙著《記孙中山南下护法后十年間粵局之演变》一稿中一至六节，則可視為本篇之續文也。回首前尘，屈指已閱半世紀，記憶上之遺誤及不全面之处，在所不免，甚望亲其役者有所补正。

二、“二次革命”失敗后国民党員概况及

广东之“討龙”

一九一三年（民二、癸丑）秋，“二次革命”失敗，中山先生既由滬避居日本东京，各地国民党知名人士在袁世凱压迫搜捕下亦紛紛逃亡自保，徐图再举。当是之时，北方数省人士多託庇于天津租界，长江各省人士多云集上海，两广及云貴人士則投奔港澳。其中一部分主要人員，更远走东京依中山先生，如上海之陈其美、吳忠信、蔣介石、戴季陶，湖北之居正、田桐，湖南之覃振、譚人凤，广东之胡汉民、廖仲愷、朱执信、邓仲元，四川之熊克武、謝持、楊庶堪，福建之許崇智（本籍广东），河北之張繼是也；或則先后远遊歐美或南洋，如黄兴、鈕永建（以上美国）陈炯明、李烈鈞（以上歐洲）、林虎、柏文蔚（以上南洋）是也。至于汪精卫，在整个討袁时期，皆远遊歐洲，在民元出国前，一方面接受过袁世凱贈送十万元，后道經广州，广东都督胡汉民又曾送其十万元作办杂志經費（胡因此曾受省議會部分議員攻击），汪以后政治态度却甚曖昧，其后亦无参加中华革命

党，但常参与謀議及代表中山先生任对外使命。

广东方面，討袁既失敗，国民党上层人士多数出走或辞职，其未走之陈景华（广东警察厅长）、陈仲宾（南韶連軍务督办）則同日（旧曆八月中秋夜）見戮于龙济光。我当时在广州任职广东陸軍測量局长兼測量学校校长，聞二陈被害之訊，次日即潛离广州，避往香港。其时袁世凱繼解散国民党之后，先后終止国會議事及下令解散各省議會，参与討袁之役人物，武职旅长以上，文职厅长、省議員以上多被通緝甚至捕杀。（其著者江西籍众議員徐秀鈞被杀于南昌，广东籍众議員伍汉持被捕杀于天津，前重庆軍政府都督張培爵亦被杀于天津。）我名亦在被“明令”褫职通緝之列。

我留居香港数月，鑑于国内革命既遭挫折，留港同志組織涣散，生活艰难，情緒低落，欲图再举，亦暫无可能，遂自筹資斧，于是年冬（十一月）离港赴南洋。同行者有測量学校旧同学賴少璧，紫金人，名汉琛，曾任陈炯明都督府偵緝处长，亦同盟会同志也。我等到南洋目的在找陈炯明請示今后在广东如何进行活动，陈炯明时在星加坡。我在星埠与陈晤見，陈态度消极，認為目前国内革命条件不成熟，暫时无可能采取行动，囑我等休息一个时期再說。当时国民党人張繼、李烈鈞等亦先后抵星，常与陈炯明相过从，我在陈炯明座中亦曾与張、李二人晤面，彼等在言談中所表現政治态度与陈炯明如出一气，盖亦多少受黃兴态度之影响也。

陈炯明态度处处显出对东京中山先生方面頗有隔膜，并謂已决定赴歐洲旅行。我見陈对广东工作无积极指示，遂亦决定筹措旅費，游历英荷属各埠，观看海外同志对革命的情緒如何。在我此次旅行中接触較多之国民党或前同盟会同志計有：

星加坡：張永福、陈楚楠、林义順；

庇能：陈新政、熊月山、張杜鵑、李怀霜（李时任庇能光华报主笔）；

霹靂：郑螺生、罗立志、李源水、李孝章；

芙蓉：邓泽如、蔡熾三；

吉隆坡：陈占梅、陆秋露；

日里：梁瑞祥、刘士木及侨校教員多人如李次蕃、蕭君勉等。

以上各人，皆当时海外民党比較知名人士，大家对“二次革命”失敗，观感虽不尽同，但仍表示愿繼續为革命而奋斗。其中尤以邓泽如、郑螺生、李源水等人态度最坚决，在华侨群众中进行反袁宣传活动亦最积极。

我在各埠漫遊数月后，即再返星加坡（約为一九一四年三月初間）。聞陈炯明即将放洋赴歐，我偕賴少璧再晤陈請示动向，陈当时囑我偕賴少璧、丘耀西（惠阳人、陆軍學生、曾任广东陆軍第二师的团长）先回香港，并交我們港币三千元为活动費，另每人給船費各一百元。陈此时态度稍积极，他囑我們回港后調查广东政情，并注意聯絡和物色干部，必要时不妨采取暗杀手段对付龙济光等反动分子。我們接受任务，于三月中旬回到香港。是时朱执信亦由东京回港，着手策划反龙（济光）民軍活动，当时周之貞、朱卓文等亦搞民軍，但彼此活动上各搞一套，不相統属，步骤不无紊乱。

五月間，邓仲元亦自东京奉中山先生命回香港負責軍事。我晤邓仲元后，即被邀参加工作。是时中华革命党虽未正式宣告成立，但东京方面，已决定軍事上以中华革命軍为旗帜，并曾派員分赴各省秘密进行。邓仲元名义为中华革命

軍广东总司令。据悉，中山先生原拟委朱执信負广东方面軍事之責，但由于朱对改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意見与中山先生不一致（朱对中华革命党拟議中規定附从孙先生及在誓約捺印指模等曾表示反对）故中山先生遂改命邓仲元負責，（执信乃偕胡毅生等同港，自动去搞民軍，其后执信改变态度，加入中华革命党，中山先生始又以斯責委之而以仲元为其副貳，时在民四以后）。是时邓仲元已在港秘密成立一軍事指揮机构，內部幕僚除我（兼理財務）之外、尚有随邓由东京回港之謝崧生（梅县）、龙俠夫（貴州）、洪兆麟（湖南）等，及原在香港之陈可鈺（清远）、李雄偉（字杰夫、三水）。繼又先后有刘震寰（广西），邓文輝（江西）、陈养初（云南）来港加入工作。邓仲元此时名义上与朱执信虽不相統属，但亦有所联系，合力策动原来旧陸軍（未被遣散的）及广东警卫軍（省防軍）和各地民軍相机起义。其时正当中华革命党成立前夕，除中华革命軍之活动已因邓仲元之回港而先行展开外，东京方面，亦先后派叶夏声（广东）、苏无涯（广西）二人来港（彼等同港在邓仲元回来之前）筹备粵桂两省党务机构，先行吸收中华革命党黨員。我当时与苏无涯同住一处，并通过苏之关系而加盟入党。叶苏两人虽負責筹备工作，但由于东京本部当时注意力側重于軍事方面，对党务机构，不急于求成，故粵桂两省始終未委出正式支部长，只有进行个别甄审旧国民党員吸收新黨員。事实上，两广軍事活动进展不大，組織在內地既不能立足，在香港亦受到英政府之压力，此亦支部迟迟未能正式成立之原因（究竟其他省市有无正式成立过支部，如有，大都只在天津、上海、汉口等处租界而止，未能深入內地也。詳情我亦不大清楚）。

邓仲元领导下之中华革命军活动，在是年六七月間联络成熟，粵东方面，陆军团长邓承昉（湖南）起义于潮属之黄冈，但旋即为龙济光所击败，营长王国柱陣亡。邓承昉失败后逃回湖南，途經江西被执就义。八月，邓仲元又命洪兆麟入惠州发动旧部起义，由于当时已联络好之警卫军两营临时未能集中，洪只率民军一部分单独作战，又被龙军击败，洪个人负伤脱險回香港。与此同时，朱执信亦在南海、番禺、三水一带发动民军起义；朱卓文在香山（今中山县），周之贞在順德，李海云、邹武等在高雷，亦从事民军活动。彼等此时尚未用中华革命军旗帜，彼此虽遙有呼应，但无统一行动计划，各自作军事冒险，結果亦无成效。此外，龙侠夫曾向邓仲元言省内济军某部可以运动起义，但邓未敢置信，姑遣布耀庭（旗人）前往活动，布入省垣不久即失手被捕就义。

省内各路討龙军事既先后告挫敗，各方面意見紛紜，东京方面亦以經費支絀，接济不繼。邓仲元于苦悶之余，遂命我再赴星加坡就商于陈炯明。陈告我已定期与張繼、李烈鈞等人赴歐洲，囑我轉告仲元暫将軍事行动放下，仅汇仲元港币三千元为留港同志生活补助之用。时賴少璽已以急病歿于香港，陈又囑我轉告丘耀西暂时停止工作。我回港向邓仲元复命，邓見經費接济不繼，軍事活动亦无可为，遂考虑采取恐怖政策，命鍾明光入广州伺机行刺龙济光（詳后文）。討龙军事至此又暫入低潮，香港軍事机关实际上亦告結束，只留陈可鈺、洪兆麟、龙侠夫、李雄偉等数人办理善后和联络工作。（除罗翼群随邓往南洋外，留港之陈可鈺、洪兆麟先后被港英政府逮捕入獄，龙侠夫变节，邓駐港机关，无形解体。）

一九一五年春，邓仲元邀我同去南洋。是时中山先生已将国民党改組为中华革命党，并在东京正式成立本部。

三、中华革命党在南洋的活动和与陈炯明等的

“水利社”之斗争

中华革命党于一九一四年七月八日在东京正式成立。在酝酿期間，中山先生遭到极大困难，主要是由于国民党內上层人員之間，革命情緒消沉，对改組为中华革命党之建議，多表反对。其中黄兴反对尤力，黄曾公开表示，国民党人应顧全大局，在十年之內，不妨让袁世凱放手处理国事，并以为袁搞好，大家都好，搞不好，自然会有人出而反对。此种取消革命之論調，当时頗有市场，甚至被誉为深得‘天下为公’之旨趣。辛亥之际，同盟会會員中出任各省都督者凡六人，二次革命失敗后，除胡汉民、陈其美二人坚决拥护中山先生改組国民党繼續革命之主張外，其余李烈鈞、熊克武、陈炯明，柏文蔚四人当时皆支持黄兴意見（直至民国四年二月間黄兴等尙先后发出两电，以“效法平西，以图一逞”暗誣中山先生联日反袁，又謂“国人既怨兴等癸丑之非，自后非有社会真切之要求，决不輕言国事”，公开承認“二次革命”为錯誤，表示不再革命——見章士釗《歐事研究会拾遺》一文，載全委《文史資料选輯》第二十四輯）。中山先生为求重新团結党內力量，曾忍耐相待，迟迟未宣告改組，后見事已无可挽回，乃决定于七月間宣布成立中华革命党，号召海內外加强討袁活动。关于东京本部人选方面，原定总理之下設协理一职，本拟推举黄兴担任，但黄远遊美洲，表示不愿合作，此职遂付缺如。此外，中山先生对朱执信一向

昇倚甚殷，原来名单中亦内定以朱为政治部副部长，但朱迟迟不宜誓加盟，故当时亦不予发表，据说曾征求楊庶堪就是职，楊以不愿居副辞。除此之外，本部选定人员，列举如下：

• 总 理：孙 文

协 理：

总务部长：陈其美 副部长：謝 持

党务部长：居 正 副部长：田 桐

财政部长：張人杰 副部长：廖仲愷

政治部长：胡汉民 副部长：

军务部长：許崇智 副部长：邓 鏗

一九一五年二月，我随邓仲元到南洋。事前邓仲元曾向东京本部报告，取得同意暂时結束港粵方面之軍事（計劃中之鋤奸活动除外），并由本部給予視察南洋党务及联络侨胞，吸收党员等名义及任务。其时由于黄兴一派之消极影响，海外人士对中华革命党一般均缺乏足够信心。叶夏声，苏无涯二人长時間在香港活动，但吸收党员并无成績，其他海外地区，情况更坏。

在当时海外情况看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只办有一个《民国杂志》，在南洋只是星架坡有一个《国民日报》（在美洲我不清楚），宣传力度薄弱，各地过去原有不少保皇党报刊，在“二次革命”以后，皆已变为“保袁”之喉舌，其理論之謬，較前尤甚。加以原国民党黄兴一派与中山先生不合作，此派人物亦在海外大肆活动，反对繼續革命，海外侨胞方面亦頗受其影响。我与仲元到南洋时，沿途所見各地华

文報紙思想混亂，一些報刊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條款以後，且誣蔑中山先生勾結日本。在英屬海外殖民地中，由於英政府支持袁世凱政權，故對海外反袁活動，也密切注意，或明或暗時加干涉。我等抵星架坡後，陳炯明仍未赴歐，仲元即偕我同往見陳，陳是時居于林義順（星架坡同盟會老同志）之別墅，林過去本熱心革命，但由於陳炯明之影響，此時卻不願參加中華革命黨，因而在星著名之老同盟會員如張永福、陳楚楠等，均不參加，影響中華革命黨組織發展甚大。鄧仲元向陳炯明會報廣東討龍活動失敗經過後，陳炯明即力言目前國內外形勢對革命無利，不主張繼續搞下去，認為勉強搞也必無成功。蓋當時不止廣東方面討龍失敗，中山先生曾命陳英士使陳中孚等去大連圖東北，使范鴻仙（光眉）至上海圖江浙，均告失敗，鴻仙且被袁派人刺死。故當時態度消沈者，不止陳炯明為然。陳并言他個人已準備妥當，日間即偕李烈鈞、張繼二人赴法國，并有黃強隨行云。鄧仲元見陳炯明無意在廣東繼續舉事，遂亦無可如何。我等離星後繼續到英屬馬來亞各埠活動，經馬六甲到檳榔嶼時接鄧澤如自芙蓉來信邀往該埠會面詳談南洋黨務。我等原定前往荷屬日里，至此遂改變計劃折返霹靂，經怡保、吉隆坡前往芙蓉晤鄧澤如。是時鄧澤如已參加中華革命黨，并受東京總部命統籌南洋黨務（同時命林森統籌美洲黨務），在当地積極展開活動。我等晤見鄧澤如後，获悉陳炯明、柏文蔚、李烈鈞、熊克武、林虎等已成立所謂“中華水利促成社”，在海外用該社名義到處籌款，名義雖為發展國內水利建設，實則與中山先生領導下之中華革命黨相對立，從事派系分裂之政治活動。據鄧澤如言，彼等在南洋亦擁有一部分附和者，雖然籌款所得數目有限，但對中華革命黨在南洋籌款工作，則已大起障礙作

用。盖自“二次革命”失败后，海外侨胞情绪本来已入低潮，由于“水利社”一派对革命散布謠言，使一些人被愚惑，不愿出钱出力。经过邓仲元、邓泽如二人研究后，一致认为首先应该设法抵消“水利社”一派的破坏作用，当时便决定由芙蓉联电东京本部，请中山先生从速增派一些得力人员来南洋进行活动。电去后，不久，中山先生即派许崇智（军务部长）和海军将领宋振及叶夏声等前往南洋英荷各属地活动，同时又派郑鹤年（福建人，菲律宾华侨）、黄展云（前任福建教育厅长）赴菲律宾。美洲方面亦另派人前去协助林森（南北美总支部长）工作。是时中山先生已派邓泽如为中华革命党南洋总支部长，邓名义上虽未就，实际上已负总其成之责。

我等在南洋旅次，阅报获悉钟明光刺龙济光不中，壮烈成仁。仲元为之悲愤不已，遂囑我留怡保活动，邓个人出星架坡拟再晤陈炯明。抵星时陈已赴欧，仲元乃决定离南洋去东京向中山先生报告南洋情况。舟经香港时，龙侠夫等登轮迎仲元，力言济军方面事还有可为，劝仲元登岸留港小住。仲元疑其言过其实，不听，原船逕赴东京（其后洪兆麟被诬为行劫惠州之匪徒，遭港政府逮捕，陈可钰亦因由澳门带炸药回港被发觉拘捕，当时关系龙侠夫变节告密所致，并闻告密关系系通过曾任龙济光之顾问龙积之以达云。按龙积之为广西桂林人，康有为弟子，辛亥前曾参加光复会，亦“苏报案”中有关人物之一。党人对龙侠夫之变节告密，脚恨极深，其后李杰夫等遂在澳门诱其饮醉，以囊包裹而沈之大海，以惩奸洩愤云）。

我奉邓仲元命留怡保活动，寓民元时广东北伐军华侨炸弹营营长罗立志家（立志在坝罗即怡保营小规模开锡矿业），

当时主要任务为对付“水利促成社”一派人的謠言破坏。当地国民党同志中热心参加中华革命党者計有郑螺生、李源水（即王源水）、李孝章、区慎刚、朱赤霓、謝八尧等，在彼等协助下，曾将一部分前同盟会同志吸收回来，使其摆脱“水利促成社”一派的拉攏，并曾吸收得新党员百余人，大都为錫矿工人。

“水利促成社”分子在海外活动相当猖獗，彼等砌造謠言，誣蔑中山先生勾結日本以遏制袁世凱，企图将侨胞对袁氏卖国罪行之憎恨，轉移于中山先生及中华革命党，用意相当毒辣。其时該社主于人物之一柏文蔚亦来怡保活动，当地华侨与国民党及原同盟会同志曾在“文明俱乐部”（为当地侨領梁榮南、梁恩权、梁德权、郭应章等各富商所組織，經常在此招待国内来南洋人物）設宴招待。在席間有人談及日本所提二十一条款时，柏文蔚竟公然对众人說，不少人怀疑此是孙中山串通日本人向袁世凱搗旦，我当时即插口質問柏本人是否相信。柏不置可否，但曰：“人言可畏”。我憤而与柏拍桌爭論。自柏文蔚到怡保后，不久，岑春煊亦来过，当地华侨同志思想更形混乱，对我等所进行之筹款及吸收党员工作，造成极大障碍。未几許崇智及宋振二人亦抵怡保（叶夏声未見到）下榻于区慎刚別墅，但活动結果，未見有何成績。与此同时，在广东方面搞民軍之朱执信、朱卓文、周之貞等亦向南洋同志活动筹款，由于彼此行动不統一，当时頗为中山先生所不滿，曾亲函邓泽如囑予制止（函見《总理全集》及《中山先生致邓泽如手札》，后来印书时，以朱已为国捐軀，胡汉民邓泽如等有意为朱諱其事，凡函中提及朱姓名之处均被挖去）。我在怡保曾与許崇智、宋振二人晤見，当时二人甚年青，在資望上尙不能与柏文蔚輩相匹敌，当地

华侨同志，亦咸有此觀感。我在去函东京本部时，除詳述柏文蔚等活动外，亦曾提到此点，并建議中山先生加派党内資望較高之同志（如陈其美、胡汉民、居正等）二三人前来南洋，以共同扭轉当时之困难局面。

是年八月間，我自怡保出星洲，时許崇智已前往荷属，旋返东京，只留宋振一人在星，我遂約其同往东京，报告南洋方面工作情况。

四、东京紀行及香港《現象报》出版

一九一五年八月間，我偕宋振在去东京途中泊舟香港，我登陆訪邓士学（邓仲元之弟，現居香港）知洪兆麟被港政府拘捕下獄状况，我即偕士学前往域多利監獄探視，因此耽擱誤过开輪时间，不及上船，宋振乃将我船上行李携交东京邓仲元处，先妻徐芷齡为之一惊，誤以为有意外，时芷齡留日学画，寄居邓仲元家也。我乃改搭下班輪船前往上海轉輪赴日，在上海登輪时，遇陈群及蕭冠英二人亦上船同行。抵东京时已九月中旬，适逢旧历中秋节。登岸后由蕭冠英为我作响导，一直往东京“崇雅”見邓仲元于其住所。次日邓仲元即引我至赤坂区灵南坂町头山滿家中晉謁中山先生。是日戴季陶、胡汉民亦在座。我向中山先生会报南洋情况，并建議速派得力主干同志前往，加强本党号召作用，以肃清“水利促成社”一派的消极影响，中山先生聞言頷首者再。我报告既毕，在告辞时中山先生囑我分別去見陈其美，居正、許崇智、廖仲愷等各部长及即时介見头山滿。当晚，廖仲愷承中山先生之囑，在帝国劇場設宴为我洗尘，同席者有陈其美、胡汉民、居正、楊庶堪、戴季陶、許崇智、宋振、邓仲元